

Orient. Seminar
Universität
Freiburg/B.
Inv.

China Y2 6-1

S 12/0734

新闻业务

XINWEN YEWU

活叶版

1

总 1550 期

1978年1月23日

新华通讯社编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打碎“四人邦”的精神枷锁

甩开膀子大干

——河南分社情况简报

河南分社同志普遍反映总社这次电话会议很及时、很重要，深受教育，大受鼓舞，思想触动很深，解决了不少认识问题，明确了努力方向。

一、一九七八年是抓纲治国大见成效的重要一年，我们怎样大见成效？

大家对照总社和《人民日报》领导同志讲话中提出的要求，认识到任务重，要求高，形势非常喜人、非常逼人；自己差距很大，很不适应，再不急起直追，就要掉队。一些年纪大些的老记者检查了退坡思想、甘居中游思想，表示要抓住有限的时间，为党多做点工作。一些年轻的记者，原来认为“当记者不怎么难”，“写稿子嘛，开头戴上几个帽，大小导语套一套，现成句子去抄报，咱也可以凑合过”，电话会议以后，感到记者难当了。有的同志说：过去几年受“四人邦”毒害，稿子大同小异，今后那一套不行了，必须从头学起。也有的同志说：过去十几年混过来了，要当一个真正的好记者很难，今后可混不下去了。有些同志原来有自满情绪，认为各方面都“过得去”。但是一对照任务和要求，感到跑步也难赶上，真是火烧屁股，坐不住了。有的同志说：过去几年在尖锐的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连滚带爬，带着内伤、外伤闯过来了，没有和“四人邦”搞到一起，自己心安理得，现在感到如果不来个彻底革命，就过不去了。大家认为，一九七八年，我们的报道要为大见成效服务得好，关键在于主观努力。一定要拨乱反正，破旧立新，解放思想，使思想和工作都大见成效，才能做出新贡献。

二、着重讨论了如何在政治上业务上解放思想的问题。

分社在贯彻国内工作会议精神过程中，强调要解放思想，打碎“四人邦”的种种精神枷锁。参加电话会议后，感到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至今外伤、内伤加在一起，思想上还被“四人邦”的许多紧箍咒束缚着。大家列举事实，揭批“四人邦”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人的思想搞乱了。很多同志亮了思想，找了原因，摆了表现，总结了经验教训，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从个人得失打圈子，怕犯错误。对思想路线是非的许多问题不敢碰。不是主动出击，而是绕开矛盾走。一些过去在报道上出过问题、挨过批评的同志，更是心有余悸，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碰尖锐问题，不去冒风险。因此，许多同志对界限分不清的问题，不去钻研；对牵涉面大的问题，不去触及。结果是头脑中“禁区”越来越多，路子越走越窄，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能正确地、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是少数受“四人邦”影响较大的同志思想上还有包袱，对讲清自己的问题还有抵触。听了这次电话会议的讲话以后，有的同志检查说：一年来我背了包袱过日子，始终没有从“四人邦”影响的小圈子中跳出来。过去受“四人邦”影响，把问题看反了，现在还陷在错误的圈子里拔不出来，为自己的错误狡辩、不认帐，这怎么谈得上解放思想呢？我一定要向“四人邦”讨还时间，放下包袱，讲清问题，分清路线，大干一九七八年。

三是部分同志深深感到理论水平低，调查研究差，对复杂的客观事物抓不住本质，分不清是非，只好人云亦云，敲“顺风”锣，写“保险”稿。一九七六年明明是群魔乱舞，却总是写“莺歌燕舞”，结果犯了错误。

大家认为，必须首先打掉思想上的拦路虎，甩掉思想包袱，敢于解剖自己，才能砸烂“四人邦”的精神枷锁，分清路线是非，真正解放思想。

分社和小组以及记者还讨论、制订了一九七八年的规划，对学习、批判、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参加劳动、报道的主攻方向、重点报道题目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通过贯彻总社电话会议精神，分社新气象多了。原来包袱背得很重的同志，有的已有明显转变，由抵触、消极变为自觉、主动。开始钻研业务的人多了。不少同志晚上干到半夜，假日也不休息，过去松松垮垮的现象有了很大变化。但这仅仅是开始。这次讨论还不够深，规划也比较粗糙，有些同志还有思想包袱，积极性还没有调动起来。分社准备进一步贯彻总社国内工作会议和这次电话会议精神，争取在新的一年里，各项工作有更大的进步。

第一期国内记者业务训练班即将开学

为了深入揭批“四人邦”，分清新闻战线上的路线是非，恢复、发扬我党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业务水平，总社决定举办国内记者业务训练班，第一期定于二月十五日开学。这一期学员暂定四十余名，由总社国内部各组和各分社选送一名，半分社四名。学员条件是：在党的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和比较好的，具有一定业务水平的同志。

第一期学习时间暂定三个月。

解放思想 发扬革命传统

大 干 一 九 七 八 年

——安徽分社情况汇报

安徽分社同志对总社电话会议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着重就以下三个问题，畅谈了体会和意见：

一、思想要彻底解放。大家一致认为，总社这次电话会议，是解放思想的动员大会。总社和《人民日报》领导同志的讲话，就给解放思想做出了样子。同志们说，“四人邦”横行时期，我们不敢讲真心话、老实话，思想被“四人邦”的帽子、棍子、刀子紧紧束缚着，压制着。“四人邦”粉碎后，思想虽然有所解放，但很不够。例如：有些同志在怎样看待十七年，怎样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造反派等等问题上还是心有余悸；在宣传报道中不敢大胆地去提出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不敢主动打进攻战，该碰的不敢碰，该翻的不敢翻。听了李普同志、胡绩伟同志、曾涛同志的讲话后，大家坐不住了，感到差距太大，必须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思想上来个真正的解放。大家认为，要解放思想，就是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宣传报道中，对“四人邦”搞乱的许多问题，就是要敢于大胆地碰。分社准备具体、认真地分析研究下一步在安徽要碰什么问题。

二、要努力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李普同志在讲话中提出，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为资产阶级服务得很好，我们无产阶级新闻记者为本阶级服务得怎么样？大家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很重要。许多同志说，我们过去的许多报道，跟着“四人邦”念“邦经”，充斥着假话、空话、套话，不去解决群众所关心的实际问题。这不但无益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谈不上为无产阶级服务，而且严重地损害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实际上是背离了无产阶级利益。至于有意去造假，那更是违反无产阶级新闻的原则。对此，我们作为无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怎能不感到惭愧？！我们必须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这个根本观念，要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要以这个标准去评判稿件和记者工作的好坏。有的对外记者说，过去我们的对外报道很不成功，外国人不欢迎，这同我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很不相称。作为对外记者，问心有愧。现在，总社领导对对外报道十分重视，这使我们很受鼓舞，一定要下决心，把对外报道搞上去。

三、业务要大提高。同志们说，我们要树雄心、立壮志，把自己培养成为高水平的无产阶级记者，写出高水平的新闻报道。为此，业务上，必须来个大突破、大提高。要提高业务水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把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作为首要的基本功来苦练。只有真正地经常地做到深入，才能倾听到群众的呼声，与群众息息相关，患难与共，使我们的新闻报道切实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战斗。只有经常做到深入，才能从

（下转8页）

彻底清算“四人邦”控制上海分社 在工商报道中制造假典型的罪行

上 海 分 社

在贯彻国内工作会议精神的专题讨论中，上海分社工商组的同志着重讨论了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全组同志比较彻底地清算了“四人邦”及其余党控制上海分社，在工商报道中制造假典型的罪行，总结了经验教训，提高了路线觉悟，决心坚持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搞好今后工作。

（一）近几年来，在“四人邦”控制下，分社工业报道造假的基本情况。

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工商组共发公开报道二百十七篇。这些报道，基本上都是为“四人邦”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基本上都是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的。

下面剖析几组假报道，看看这些报道造假的严重性。

第一组，钟表元件厂的报道。

一九七六年，“四人邦”疯狂攻击诬陷邓小平同志，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钟表元件厂的报道紧紧跟上，二月到八月连续发了五篇稿子，在报纸显著地位刊登，为“四人邦”篡党夺权服务，流毒全国，影响很坏。这组报道的出笼，首先是因为“四人邦”背着毛主席搞阴谋，“四人邦”及其余党控制了上海分社。同时，也有新闻造假的错误。要写出那么几篇报道来，厂里提供的材料是不够的。记者按照错误路线的要求去深入“挖掘”，将挖来的材料排列组合，挖空心思写成热热闹闹的样子。有的班组只是一次批判会，一块黑板报，一篇发言稿，记者也都充分利用来作为报道材料。有人称记者是“高级裁缝师傅”。八月份要求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记者打电话给厂里讲了这个要求。厂里对《论总纲》还没有大张旗鼓开展批判。记者说，“这怎么办。总不能写批两株大毒草。”厂里马上心领神会地说：“那我们现在就组织批，反正我们是要批的”。就是这样，厂里边“批”，记者边写，欺骗了读者。

第二组，上钢五厂的报道。

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人觉悟了，钢上去了》以及一九七六年三月“批唯生产力论”的报道中，为了论证人觉悟了，钢可以上去这个观点；以及马天水胡说的批“唯生产力论”批上去的这个反动论点，记者违反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回避了这个厂一九七四年钢产量比一九七三年下降百分之十四这个基本事实，采取不恰当的手法以假乱真。《人觉悟了，钢上去了》一稿中，是这样写的：“七三年这个厂钢产量创造历史最高水平，七四年特殊钢产量比六五年翻了一番，七五年一至七月份钢和钢材产量又比七四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八点八三和百分之六点四。新产品增长百分之三十。”见报的数字一个没错，但总的概念是把七四年的下降说成了上升，造了假。在批“唯生产力论”这篇报道中，基本上用同样的手法写道：“七四年，革命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七五年提前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七一年以来的五年间，全厂钢和钢材的产量，比三五期间分别增长百分之六十六点八和百分之八十六点九，钢材品种规格

激增了一万一千八百多种。”仅仅在这两篇报道中，就采用了四种比法：有的跟上一年同期比，有的跟六五年比，有的拿“四五”跟“三五”比，有的拿单品种比。把说得响的突出出来，不利的避开，制造假象。

第三组，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报道。

我们长期在上海工作，知道“四人邦”及其余党是不准讲专业管理的。他们搞所谓“无制度工厂”。我们对于上海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也看到不少。但是，由于被“四人邦”搞乱了思想，记者把“四人邦”一套看作是什么“新生事物”、企业管理的“方向”。在采写《企业管理的深刻变革》一稿时，分社原党委书记徐寿铿鼓吹说：这报道并不是具体讨论企业管理的方法，而是争辩路线是非问题。因此，明明知道上海企业管理问题不少，也采用歪曲事实和以点代面的办法去吹嘘。如上海企业管理本来一片混乱，我们就有意挑选几个最好的单位，以点代面，把上海的企业管理写成“一片光明”，硬说是有什么“新经验”。上棉三十三厂因为坚持规章制度，在上海是受气挨整的。我们的报道却抬出三十三厂来骗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上海也是讲规章制度的，这完全不符合上海的真实情况。

第四组，“风庆轮”和大平板车的报道。

“四人邦”、马徐王为了篡党夺权，大批所谓“洋奴哲学”，制造许多假事件，强加到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领导同志身上，然后加以批判、攻击。“风庆轮”事件、“大平板车”事件都是这样。以“大平板车”事件为例：一九七四年，交通部给上海下达制造大平板车的任务。“四人邦”在上海的余党不顾国家的需要，无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交通部就准备从国外进口。可是在讨论进口问题时，上海的余党却倒打一耙，诬蔑交通部“崇洋媚外”，并向上海工人群众进行歪曲事实真相的宣传。工人群众听了很气忿，就日夜苦干，把大平板车造出来了。这恰好证明上海是有能力制造大平板车的。可是，上海的余党却把这件事前半部分情况隐瞒起来，大肆宣传后面的情况，攻击国务院和交通部。上海分社按照上海余党演的戏进行报道，把崇洋媚外的帽子硬扣在交通部头上。对于这样事关路线的重大问题，我们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是偏听偏信，教训非常深刻。

第五组，关于三十万瓩双水内冷气轮发电机组的报道。

这套设备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就开始设计、制造，一九七四年已经安装在江苏望亭电厂试运转，但由于“四人邦”的破坏，一些质量问题、技术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因此七四年采写好的消息和通讯一直压着不能发表。到了一九七六年五、六间，“四人邦”余党为了向国务院进攻，迫不及待地要报道三十万机组。我们也知道三十万机组没有完善，经常停机检修，有些设备（如风机）质量没有过关，但是这是“上头”要的，又怕落在《人民日报》后面，还是报道了出去。

第六组是一九七六年七月，皮塑公司“三三制”的报道。

这个公司是实行了“三三制”，但这是“四人邦”的余党马振龙打击干部的阴谋手法之一。他们借“三三制”的名义，实行“改朝换代”，把一批革命干部打下去，暗中又把一批小兄弟和角刺兼备的人物抽上来。我们只采访到现象的东西，不了解事物的本质，把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典型，报道成转变领导作风的样板。

工商组同志检查了报道，对新闻造假问题的严重性，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他们深入剖析，批判了八种新闻造假的手法：

1、回避法。对“四人邦”有利的事实，大讲特讲，突出起来讲；对“四人邦”不利的

事实，小心回避，不去涉及。如在全市工业形势和钢铁等行业的形势报道中，关于产品的产量、产值和其他经济指标的报道，普遍采用了这种手法，横比，竖比，斜比，歪比，为“四人邦”隐瞒真相，制造假象。

2、添加法。只要有一点由头，就添枝加叶，把“四人邦”的套话一句一句甚至一段一段地加上去。在“大家说”、“他们表示”、“同志们认识到”、“大家体会到”之后，大段地添加“四人邦”的观点，强加在被采写单位头上，使人哭笑不得。

3、拼凑法。明明冷冷清清、材料不多，还是东拼西凑，写得“热热闹闹”，违反真实性。

4、拔高法。抓住一点非本质的事物，就以点代面。如在关于理论队伍的一篇综合报道中，抓住个别事例，就说工厂理论队伍的骨干不脱离生产，不脱离劳动，并且扎根于班组。实际上，在“四人邦”、马徐王毒害下，许多理论骨干都是脱产的，群众是有意见的。

5、组织导演法。为了报道需要，直接组织导演采访单位的活动。

6、纳入法。明明一项成果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报道中只讲一个因素，削足适履，纳入“四人邦”的轨道。

7、歪曲法。歪曲事物原来面目，硬做文章。如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到金山视察工作，作了一些指示，这些指示都是正确的。但是到了一九七六年，为了配合“四人邦”的宣传，却抓住片言只语，斩头去尾，歪曲原意，进行批判。譬如，小平同志听说金山一年有七亿利润，很高兴，说我明年向你们要七亿利润。一九七六年，我们的报道就抓住这一句话，硬做文章，作为“利润挂帅”进行批判。

8、移花接木法。“四人邦”和马徐王要记者总结十七棉三纺工场甲班所谓群众管理的经验。后来，王洪文作贼心虚，又要加上专业管理，记者马上改写。但是事实是这个班的专业管理已经取消了，结果就把工场的专业管理套到甲班头上。这个所谓经验最后没有刊登，但并不能减轻报道中造假的错误。

（二）破坏新闻真实性，制造假典型、反革命典型的根子在哪里？

这些稿子都是我们写出来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但根子在哪里呢？在讨论中，工商组的同志越来越清楚地感到，根本在路线，领导是关键。根本的原因是“四人邦”、马徐王利用我们；是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了我们；是上海分社原党委书记徐寿镗紧跟“四人邦”毒害控制记者，一步步引导记者去这样干的。分社的假典型报道，都是有“四人邦”的背景的。他们采取种种卑鄙手法，或是把炮制的黑材料塞给分社发稿；或是假造事实，指定分社报道；或先炮制好黑典型，然后下令分社去报道；或者是把一些事情的真相隐蔽起来，制造假象，要记者去为他们作宣传；或是对毛主席肯定过的一些典型，进行破坏，塞进么货，以假乱真。对“四人邦”和马徐王利用分社制造假报道，为其反革命目的服务，分社前社长徐寿镗是竭力要记者去搞的。他在记者中不传达或不认真传达毛主席指示，拼命灌输“四人邦”那一套。他在分社历次另搞一套的政治运动和平时的所谓“政治工作”中，对记者实行严密的思想控制，不准记者发表任何不利于或怀疑“四人邦”、马徐王的言论，否则就要扣上对“中央领导”“炮打”、“不满”等等大帽子，批整一通。徐寿镗秉承“四人邦”旨意，大搞奴隶主义和驯服工具论。这样久而久之就搞乱了记者的思想，弄得记者有问题看不清，只好作他们的驯服工具，叫搞什么就搞什么。徐寿镗为了给“四人邦”制造假报道，还常常带着记者亲自去搞，亲自把他们的黑货加进记者写的稿子里去。他还拚命催记者搞这些假报道，搞得好的就表扬，就吹捧；不好的就给眼色看。由于“四人邦”、马徐王和分社徐

寿镗这样搞，把分社记者牢牢地绑在“四人帮”的战车上，什么调查研究，新闻真实性，统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剩下的只有“四人帮”鼓吹的所谓“事实为路线斗争需要服务”。这笔帐，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

（三）我们的经验教训。

工商组同志在讨论中认识到，这些假报道的出笼，罪责在“四人帮”，这并不等于我们没有教训要吸取。我们有许多同志是文化大革命前参加工作的，对新华社的传统是知道一点的，为什么去造假呢？有三个教训：

1、立场观点错了，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都给搞乱了，因此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大家十分痛心地看着，以上所说的假报道，都是经过自己头脑加工的，有的还是记者主动去搞的。因此，报道的错误，也反映了记者立场的错误，说明记者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站到了“四人帮”一边。

这个教训说明，要杜绝假报道，首先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只有立场观点对头，才能看出事物的本质，才能写出真实的报道来。

2、大家认为，假报道所以炮制得这么多，除了“四人帮”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们上当受骗以外，自己的私心杂念作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是一些同志怕挨整，唯恐跟得不紧。“四人帮”余党徐景贤两次来分社，都在全社大会上把记者批了一通，无限上纲，大扣帽子。马徐王、徐寿镗还对记者采用又打又拉的手法。这样一搞，我们队伍中本来思想就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快就跟着他们干了。二是有些同志为了争取入党。这个愿望本来是好的，但被徐寿镗利用，引上歧途。特别是分社树立了××这样的“闹而优则仕”的典型以后，一些同志也顺着这条错误道路走，在政治思想上紧跟“四人帮”，在报道中服从徐寿镗，尽量根据他的要求去写。三是一种比较隐蔽的名利思想。报道虽然不署名，但是在有关单位还是知道的。有些同志写了几篇所谓“有影响”的报道后，到“四人帮”控制的工交组去采访，人家另眼看待，记者就暗暗得意起来，继续跟着干。

3、没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把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丢掉了。关于不深入这个问题，开始，一些同志不大通。总觉得记者还是深入的，辛辛苦苦地搞材料。经过讨论后，大家认识到，我们这种所谓“深入”，并不是深入实际，而只是为了宣传“四人帮”的某个观点，根据一个框框，到下面去“深入”凑例子。因此，虽然我们采访的对象不少，也很辛苦，但并不真正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呼声要求，并不真正了解实际情况。对于报道需要的，我们听进去了；对于别的意见，不利于“四人帮”的议论，我们听不进去。就是听到了，也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动向”，自己应该保持距离。这样，我们的采访完全纳入了“四人帮”的轨道，自欺欺人。新华社的优良传统之一，是研究实际工作，同广大群众息息相通。而在“四人帮”横行时，我们心中没有群众，没有实际工作，确实是把新华社的优良传统丢掉了。

（四）从积极方面吸取教训，把错误变成财富，甩开膀子大干，跟上飞速发展的形势。

在检查了错误报道，总结了犯错误的教训以后，大家对“四人帮”、马徐王激起了深仇大恨，但是在没有分清路线是非以前，有些同志也产生了一些消极情绪，感到自己过去辛辛苦苦，现在欠债累累，记者越做胆子越小，下笔越来越重。回忆过去，心有余悸；看看现在，左顾右盼。因此，在工作中碰到矛盾绕道走，迁到尖端问题不敢碰，听说有意见分歧摆一摆。心里想：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少几篇报道没关系，不要去惹事生非。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因此，思想不解放，工作不活跃，缩手缩脚，畏首畏尾。

在专题讨论中，听了传达彭冲同志的指示，大家感到这种精神状态同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同全国和上海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同工作现状，同国内工作会议的精神，是极不适应的。

全组同志经过讨论，有这样几点认识：

1、打倒“四人帮”，宣传工作大解放。我们为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服务，一定要增强光荣感和责任感。过去在报道工作中犯错误，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方向路线错了。现在方向路线端正了，领导权夺回来了，我们更要自觉地拿起新闻武器，为贯彻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去战斗。我们的干劲要大，战斗的自觉性要强。

2、为贯彻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而战斗，上面所批判的那一套新闻造假的观点和手法要坚决屏弃，绝不能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准说假话。事实要绝对真实。

3、批判了新闻造假的手法，但是有一些界限必须划清楚。如批判了过去对“四人帮”唯恐跟得不紧的错误，决不能因此缩手缩脚，左顾右盼，妨碍我们现在雷厉风行、闻风而动。批判了过去任意拔高，违反新闻真实性的错误，决不是说可以不要下功夫去提炼主题思想。“拔高”是无中生有，强加于人。提炼主题思想，则是运用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对深入实际调查得来的大量情况，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制作加工。这是提高报道质量的关键之一。我们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学习华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过细地研究实际工作，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用心地提炼主题思想，写出有战斗性、指导性的报道来。批判了违反事实、随意变换报道角度的错误，并不等于现在可以不研究报道角度。相反，这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我们一定要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想方设法，选择最好的报道角度，来反映事物的本质。

经过专题讨论，工商组的同志进一步弄清了路线是非，明确了思想，提高了觉悟，鼓足了干劲。同志们表示：党对我们是这样的关怀、爱护，市委和总社、报社对我们寄予殷切的期望，全国和上海的形势发展得这样快、这样好，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解放思想，甩开膀子，迈开大步，下定决心搞好报道工作，改变我们组、我们分社的面貌，为华主席、党中央更好地服务。

（上接3页）

不断发展的实际斗争中，提出新问题，使报道有战斗性，对实际工作有指导作用。只有经常做到深入，才能了解到广大干部、群众生动丰富的实践活动，思想情绪和语言，把报道写得生动感人，克服邦八股。因此，做到深入，搞好调查研究，不仅是提高记者政治业务水平，使记者由“穷”变“富”，搞好报道的基本功，也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根本途径。一定要克服怕“赔本”的思想，坚定不移、始终不懈地沿着这条正确道路走下去。（2）狠抓业务学习，苦练写作本领，努力成为多面手。每个记者都要努力做到：消息、通讯、述评、特写等样样会写，十八般武艺件件通。分社决心采取多种办法抓业务学习，在今年做到业务上有明显进步。要研究写好千字以内的短新闻。写不短，写不好，就不通过。没有压力不行。记者也要“逼”，“逼”才能出人才。

在讨论中，许多老同志表示，一定要焕发革命青春，恢复和发扬过去好的传统和作风，更好地为党工作。青年同志表示，一定要珍惜自己的青春，发奋努力，明确目标，制订规划，扎扎实实地把基础打牢，尽速能独立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